

中蒙關係「正常化」： 一個政治現象的歷程（下）

• 劉曉原

編者按：本文第一至二節已於2022年12月號刊出；本期刊出第三至五節。

三 「民族自決」的終結

二十世紀的中蒙關係，從來就不單純是一個在法理意義上確定隸屬的問題。有論者認為，近現代世界政治體系的難題之一，是國家主權同民族自決權之間的對立衝突，而這兩項權利同樣得到國際社會的公認和支持^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二十多年裏，中蒙之間的糾葛，比中國領土主權和蒙古民族自決權這一對矛盾更要複雜^②。同這對矛盾糾纏在一起的，還有共產主義革命運動對整個近現代暨西方國際關係體系的挑戰，以及共產主義革命運動內部的種種分歧。如上篇所述，在二十世紀前半葉的多數時間裏，外蒙古獨立於中國，帶來的是一種雙方隔離但極少衝突的狀態。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國力遠強於中蒙的蘇聯的介入。除了地緣政治上的意義外，蘇聯的介入還意味着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對中蒙社會的影響深遠的滲透。1921年夏，蘇俄紅軍以清剿恩琴公爵（Роман Ф. Унгерн-Штернберг）和「白俄」軍隊的名義進軍外蒙古，造成外蒙古脫離中國的決定性條件。但是從一開始，蘇聯介入的主要目的就不是為了支持蒙古民族的自決權。據俄國學者披露，在1921年6月初，一個由俄共遠東局、外交部、遠東共和國、紅軍代表共同參加的聯席會議認定，向外蒙古出兵可以達到「一石三鳥」的效果：其一，可以顯示蘇俄和遠東共和國的力量；其二，利於鞏固蘇俄遠東後方的安全；其三，順勢準備在中國和外蒙古開展革命。當時，恩琴對蘇俄已不構成真正的軍事威脅。對列寧和蘇共領導來說，正當世界革命在西方面臨挫敗的時候，通過進兵外蒙古在東方展示共產主義革命的活力，遠較剿滅恩琴更為重要^③。

但是，在列寧的世界革命理念之下完成的進軍外蒙古，其後續發展卻演變為斯大林維護蘇俄帝國的一個步驟。列寧在世的最後幾年裏，同斯大林在組建蘇聯和民族自決原則等問題上進行過激烈的爭論，但此時列寧已經無力影響蘇聯的民族政策走向^④。在臥病期間，列寧口述了一份關於民族自治的備忘錄，對蘇聯政府機關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指明這個政府機關^⑤：

是我們從沙皇制度那裏接收過來的，不過稍微塗了一點蘇維埃色彩罷了。……在這種條件下，很自然，我們用來替自己辯護的「退出聯盟的自由」只是一紙空文，它不能保護俄國境內的異族人，使他們不受典型的俄羅斯官僚這樣的這種俄羅斯人，大俄羅斯沙文主義者，實質上是惡棍和暴徒的侵害。

正如列寧在病榻上意識到的，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理想下獲得政權的布爾什維克黨人，很難抵禦沙俄帝國主義遺產帶來的腐蝕。十幾年以後，列寧批評的現象，在本文上篇提到的蒙古總理根登（Пэлжидийн Гэндэн）與斯大林的爭吵中，表現得淋漓盡致。

然而，在共產國際的襄助下集結起來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對蘇聯政策的表裏不一並無意識。1920年代，蘇聯和共產國際向中國和蒙古的革命黨人提出，蒙古應當在中國革命成功之前保持自治，而在中國革命成功以後，蒙古可以和其他邊疆地區一起加入中華聯邦。在當時中國和蒙古的所有政治黨派中，只有中共完全支持這個日程。在中共黨人看來，蒙古在中國反動時期「自由分離」，爾後在中國革命成功之期「自由」地加入中華聯邦，這樣既體現了共產國際關於民族自決權的解釋，也符合中國自身的利益^⑥。1924年，在中蘇政府就蒙古問題進行談判期間，時任北京政府外交部部長的顧維鈞同中共領袖李大釗有過一次交談。李大釗認為，即使蒙古處於蘇俄控制之下，也會比留在中國之內要過得更好，顧維鈞聽後感到十分震驚^⑦。在顧維鈞聽來，李大釗的言論幾同賣國。但是，李大釗看到的是一種「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革命的前景。在蘇聯外交政策和當時北京政府的官方立場之間，李大釗是前者的堅定支持者。他撰文表示^⑧：

本月六日，蘇聯大使照會北京執政府，聲明已得蒙古當局之同意，先撤蒙古境內的赤軍，希望中國與蒙古人民，藉和平的了解解決兩兄弟民族互相關係的問題。吾中國民眾於感謝並諒解蘇聯之尊重中蒙兩民族的自主自決，渴望中蒙兩民族的自由聯合外，並宣認明此為兩民族在國民革命旗幟之下提攜共進的良機。而嚴密的監視頑暴軍閥之以舊日藩屬征服的手段，施之蒙古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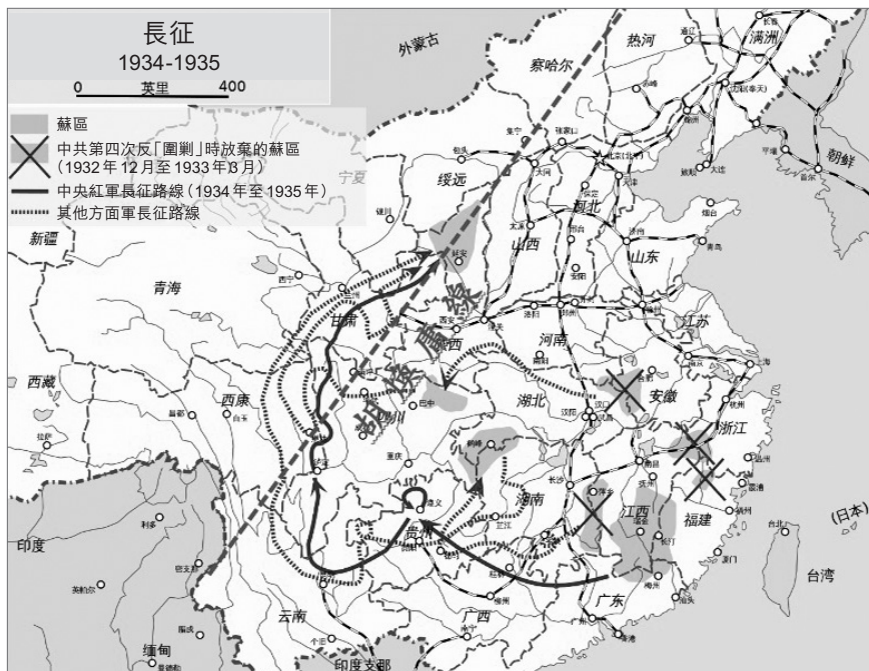
顯然，顧維鈞及後來的國民黨當局針對外蒙古問題的立場，是以「民族國家」為基準，而李大釗及後來的中共黨人在相當一段時間內的國家意識，則是以國際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為出發點。

1927年國共分裂以前，中共對中國國家疆域的觀念，包括對中國民族構成的觀點，主要是一種原則立場的宣示，基本不具有實踐的意義。1920年代末，中共開始在自己的旗幟下打江山，走上了一條與國民黨的國家機器對抗的道路。在奪取全國政權以前的長時間內，中共以「邊界割據」暨「蘇維埃共和國」的形式求生存、圖發展。在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以前，由於軍閥殘留，蒙、藏分立，新疆獨處，中共割據，日佔東北，中國大地上又再現了數個政權並立、「多國演義」的現象。毛澤東關於小塊紅色政權為甚麼能夠在中國存在的論斷，為中國現代史的研究者所熟知^⑨。這種以蘇維埃國家名義進行的領土割據，對一代中共決策者的疆域觀念，及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對疆域問題的處理，都產生了重大影響^⑩。

1931年11月7日，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江西中央蘇區成立。中共宣稱，「從今日起，中華領土之內，已經有兩個絕對不相同的國家」，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最終目的，是「建立蘇維埃政府於全中國」^⑪。中共蘇維埃政權的對內、對外政策包含了旗幟鮮明的兩條：第一，不承認此前中國與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一切條約；第二，承認中國境內所有少數民族完全的自決權^⑫。前者超越了以往中國外交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目標，宣示了中共蘇維埃的國際階級鬥爭立場，後者則表明中共服膺列寧主義的「民族自決」原則，同國民黨政權所代表的對少數民族的壓迫宣戰。換言之，中共蘇維埃政權的上述政策在實踐上的意義，並非是參與當時中國國家層面的外交及民族政策，而是拒絕現存於中國的、一切可能的對中共革命活動的內、外羈絆。被中共奉為革命樣板的俄國布爾什維克，在所謂革命時機成熟的情況下，經過十月革命一役即獲取了全國政權，隨即開始了使俄國脫離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外交折衝，並同時面臨着沙俄帝國遺留的多民族政治局面的「巨大挑戰」^⑬。中共獲取政權的道路則截然不同。中共以移植於江西瑞金的蘇維埃共和國為其革命政權的開端，實際情況是孤據山林，既脫離了列強麇集的城市地區，也遠離任何邊疆民族的「挑戰」。在長征開始以前，中共的主要活動區域局限於中國東南，在地緣意義上同西南和西北邊疆地區沒有密切的政治或經濟上的聯繫。此時中共政治話語中的「少數民族」，在意識形態意義上，遵循的是共產國際的宗旨；在地緣觀念上，抒發的是與近代以來中國民族主義國恥論相同的情懷^⑭。只是在長征根本改變了中共在中國的地理、人文坐標以後，蒙、藏、新疆才開始對中共具有切實的意義。1935年中共在長征途中發布的鼓動藏族、蒙族人民獨立的〈告康藏西番民眾書〉和〈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內蒙古人民宣言〉，以及毛澤東關於在蘇蒙邊境開闢新蘇區、「與蘇聯及蒙古共和國打成一片」的意見，表明中共對邊疆的地緣情懷，已經開始具有地緣戰略的實質^⑮。

歷史的巧合是，正當中共中央和軍事主力放棄江南，向西南、西北邊疆推進的時候，1935年，時任南京國立中央大學地學系教授的胡煥庸發表了題為〈中國人口之分布〉的文章。針對西方學界有關「中國人口過剩」的觀點，胡煥庸詳細論證了按人口平均密度，中國人口的密集度並未高於歐洲大陸，但是由於自然條件所造成的不同的生存發展機遇，中國人口呈現出在「東南半

壁」和「西北半壁」分布的極度不均衡。從黑龍江省的瑯琿（今黑河）到雲南省的騰沖，劃一條斜線將中國分為兩大區塊，這就是至今在研究中國歷史和現狀時依然引人入勝的「胡煥庸線」。胡煥庸當時考慮的，主要是如何通過移民來調整中國人口的合理分布。他指出，蒙、藏、新疆等地雖然地廣人稀，但若移民卻有「天工必然之限」，而滿洲北部雖然肥沃足以容納千萬移民，惟遭「暴日入侵……，不知何日方能重還故國，以供我華夏民族之移植經營矣」^⑩。胡煥庸或許不知道此時中共長征正打着北上抗日的旗號，在到達雲、貴以後，大致沿着他在中國地圖上劃出的那條線，自西南上溯，並將最後落腳在地處東南、西北兩個「半壁」之間的陝甘寧地區。中共中央在長征途中做出的遷至陝甘寧地區的選擇，暗合了「胡煥庸線」所揭示的極其複雜的中國地理、



長征路線與「胡煥庸線」（圖片由劉曉原提供）

經濟、人文、政治等的分野。對中共來說，這個分野使陝甘寧地區具有一種優勢，即「當地基本的漢族群眾」的革命鬥爭，同「在這個區域居住的及其鄰近的非漢族群眾（回、蒙、番）的民族解放」可以聯繫在一起，並「匯流於蘇維埃的巨濤之中」^⑪。

中共根據地向「胡煥庸線」的轉移，反映出中共在國內政治鬥爭中的邊緣化。從長遠看來，這種被迫的邊緣化對中共頗有益處。立足陝甘寧，中共

得以突破原先「南方」、「漢族」的局限，同西北民族發生了密切的接觸。中共的「少數民族」話語從而提升為少數民族政策，為 1945 至 1951 年中共自北向南、自東向西橫掃全中國的軍事和政治鬥爭，準備了必要的思想和組織的輔助條件^⑫。然而，長征對中共同外蒙古的關係，帶來的又是另一種意義上的變化。中共放棄地處中國政治文化中心地帶的華南，向漢族社會邊緣的西北作戰略轉移，其國際意圖是向蘇聯靠攏。用毛澤東的話來說：「我們總是可以求人的，我們不是獨立的共黨，我們是國際的一部分，我們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們可以先在蘇聯邊境創造一個根據地，來向東發展。」^⑬毛澤東所謂的「蘇聯邊境」，其實是內、外蒙古的邊境。向蘇聯這個「革命中心」靠攏的結果，使得外蒙古對中共在陝甘寧的立足具有了第二中心的實際功用。1920 年，青年毛澤東曾著文稱外蒙古為「奄奄欲死」的「藩地」^⑭。未曾想若干年後，比農業中國還要「落後」的遊牧外蒙古，居然在以蘇赫巴托爾（Дамдины Сухбаатар）為首的蒙古人民黨帶領下，緊隨蘇聯並先於中共建立了共產黨國家。馬克思主義到了東方似乎變成了一個「革命悖論」：愈落後的社會，愈先

完成共產革命。當時的中共領袖陳獨秀對此並不認可，著文發問：「難道遊牧的外蒙也能實行共產制度嗎？」^②長征以後的中共同外蒙古相比，在革命序列裏的位置，除了革命成功滯後以外，又出現了「邊緣」和「中心」的倒轉。

從現有的史料來看，自李大釗之後，中共歷屆領導對於外蒙古的黨政軍民對民族獨立的訴求，並沒有進行過認真的研究。這種情況同中共在陝甘寧時期對臨近的內蒙古及回族社會的詳細調查，形成鮮明對照^③。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在共產國際的體系之內，中共與蒙古人民革命黨同處於蘇聯的領導之下，是平行的關係。1926年，蘇聯駐烏蘭巴托代表尼基福洛夫（Петр М. Никифоров）向莫斯科建議，用「兩個蒙古」的方案，取代早先關於統一、解放的蒙古加入某聯邦國家的計劃。這樣既可以阻止中國的「復土主義」（irredentism），也可以消除蒙古領導人的泛蒙古主義傾向。按照這個方案，外蒙古將是永久的獨立國家，而內蒙古仍為中國的一部分。對莫斯科來說，尼基福洛夫的方案過早地在法律意義上明確了外蒙古的地位。1927年1月，莫斯科決定繼續通過共產國際指導中國和蒙古革命，在維持外蒙古模糊的法律地位的同時，照樣可以阻斷中國復土主義和泛蒙古主義。具體步驟包含三個要點：第一，內蒙古的「民族革命運動」是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領導下的「總的民族解放運動」的一部分；第二，內蒙古革命運動的領導者暨內蒙古人民革命黨，不隸屬於外蒙古而歸共產國際直接指導；第三，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工作綱領，必須反封建和建立內蒙古在革命的中華聯邦共和國之內的自治^④。這種在明確外蒙古的法律歸屬之前，蘇聯先以區別內、外蒙古「革命身份」的做法，使中共和外蒙古之間不具有「革命中心」和「革命邊疆」的關係。順便說明，共產國際分派革命領導責任的做法，也包括了西藏^⑤。其實，共產國際對內蒙古革命的指導作用在二戰期間就已終止。戰後，中共積極參與和領導了內蒙古民族自治運動。用中共在內蒙古的領導人烏蘭夫的說法，中共「克服」了戰後在內蒙古出現的獨立傾向，將內蒙古的民族運動引上了「區域自治」的道路^⑥。同時，對於莫斯科來說，在中共奪取國家政權之前和之後，蒙古人民革命黨同中共的相互平行、獨立的關係始終未變。

1949年以前，在同莫斯科和烏蘭巴托的三角關係中，尚未執政的中共顯然處於弱勢地位。至於未來中共革命成功後，中國和外蒙古的關係將如何發展，中共只能在列寧主義的「民族自決」框架裏做一番遐想。比如在1936年同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的談話中，毛澤東就充滿信心地預言，一旦中國人民贏得自己革命的勝利，外蒙古就會自動向中華聯邦回歸^⑦。這並不是說，在1949年以前中共安於服從蘇聯對外蒙古的安排。中共不止一次試圖說服莫斯科，「中國革命」的利益應該得到更優先的考慮。1930年，李立三領導下的中共企圖通過發動城市暴動奪取全國政權。為此李立三向共產國際要求，外蒙古同中共建立密切的黨際關係，並且一俟中華蘇維埃建立，即宣布加入並協同蘇聯一道進兵東北、華北^⑧。斯大林對李立三暴動計劃的評斷是「荒誕」、「危險」、「胡鬧」^⑨。

在主張城市暴動的「立三路線」破產以後，毛澤東的農村根據地也未能持久。楊奎松的研究揭示，中共開始長征以後，共產國際和蘇共領導人考慮在

蘇聯境內某地成立中共北方局，並秘密訓練幾萬軍隊，通過新疆或外蒙古向中國境內開展游擊戰爭，幫助中共重振旗鼓。在1936年初，斯大林也表示贊同中共主力向蘇聯靠攏的意向^⑳。但是中共同中國主體社會的邊緣化，止步於「胡煥庸線」。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中共不能脫離可以「指導全國革命的地區」^㉑。於是中共長征並沒有一路直奔外蒙古邊境，而是止步於陝北，徐圖北靠^㉒。但是在1936年一整年當中，中共向北、東、西三個方向擴張根據地的努力，都以失敗告終。其間中共一度又回到了李立三的思路，要求莫斯科通過外蒙古或新疆派遣空軍和炮兵部隊入華，並視之為中共西突和北進攻勢成敗的關鍵^㉓。這次斯大林對中共的要求作何評斷，不得而知。顯然，時過境遷，此時對共產國際和蘇共來說，中共已經不再是李立三式的城市暴動者，而是亟需挽救的「遊牧人」^㉔。在這一年裏，莫斯科積極謀劃，試圖經外蒙古或新疆邊境對中共提供軍事物資援助。然而，最終由於蘇聯對日本在內蒙古勢力範圍的忌憚，以及中共西征的慘敗，這些計劃都未能實現^㉕。

1936年以後的中國歷史，並沒有發生中共進一步「國際化」的一幕，即共同蘇蒙「打成一片」求生存的情況。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後，國共兩黨結成第二次統一戰線，次年全面抗日戰爭開始。中共的戰略重心得以掉頭南向，扛起「中華民族」的大旗，在政治的意義上回到了中國政治的中心舞台。抗戰八年，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抵抗日軍，中共力量在敵後戰場迅猛擴張。1945年二戰結束時，中共已經具有在地域、人口、軍事方面都足以同國民黨抗衡的實力^㉖。在這八年當中，中共領導人的國家意識發生了重大的轉變，簡言之是從原先蘇維埃模式的「階級國家」向中國「民族國家」復合。中共在「國際化」遇阻後，反而在中國全面抗戰的過程中獲得了進一步「民族化」的機遇。

這個轉變在中共文獻中是有迹可循的。1937年3月，負責中共在國統區地下活動的劉少奇致信中共中央，批評「九一八事變」以來的中共政治宣傳，只知「不大加思索」地重複共產國際關於擁護蘇聯和中國革命的論調，卻不提日本侵佔東北，不強調日本對中國領土主權的侵犯^㉗。其實，「九一八事變」不久，中共中央就已經在對過去工作的檢討中承認，以前「怕談民族兩字，怕落進國民黨民族主義的圈套中去」^㉘。這裏所謂的「民族」，自然不是列寧主義關於「民族問題」論述裏的少數民族，而是「中華民族」。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張聞天公開發表文章，表明中共對當前「民族統一綱領的意見」，包括承認「國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根據平等互助的原則，鞏固中華民國內各民族的聯合」；並特別提出，在反對「日本所提倡的大蒙古主義與大回族主義」的同時，「發動在日本虎口下的滿蒙民族同漢族聯合，共同抗日」^㉙。可見，大概是出於一種思想慣性，「民族自決」的概念並沒有從抗戰時期的中共文獻裏完全消失。但重要的是，在這個時期中共已經不再用「民族自決」鼓動少數民族對中華民國做革命的分離，而是以此概念促進少數民族同漢族的聯合。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本人已經不再使用「民族自決」這個概念。1938年10月，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做題為〈論新階段〉的報告，其中強調「團結中華各族」「為一體」，「各民族與漢族有平等權利，在共同對日原則之下，有管理自己事務之權，同時與漢族聯合建立統一的國家」。

儘管毛澤東在報告裏聲稱這個方針的目的在於取代中國過去「懷柔羈縻的老辦法」^{③⑨}，但實際上這個報告是中共從「國際化」到「民族化」的一個重要分水嶺。至此，中共自己「思索」得來的「民族自治」的少數民族政策，取代了從共產國際進口的「民族自決」。

對中共同蘇蒙的關係而言，「民族化」帶來的一個直接變化就是中共既無必要、也不再尋求在軍事和地緣意義上向蘇蒙靠近。相反，中共的新方針是在「胡煥庸線」的「東南半壁」迅速恢復影響和擴張勢力。1941年6月5日，距離德國進攻蘇聯還有十七天，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Георгий М. Димитров)致電毛澤東，建議中共「不管面對多大的困難，也要全力作戰抗擊日本的進攻」^{④⑩}。蘇德開戰以後，毛澤東一度擔心日本會撕毀同蘇聯的中立條約，協同德國夾擊蘇聯。但是毛澤東認定，即使這種情況發生，中共同蘇聯的配合也只能「是戰略的配合，是長期的配合，不是戰役的配合與一時的配合」，中共對蘇聯的「最大可能的幫助」，只能是「與日寇熬時間的長期鬥爭方針，而不採取孤注一擲的方針」。然而，蘇聯對中共同志的期望遠高於此。9月，蘇聯國防部要求中共，一旦日蘇戰爭發生，其麾下的八路軍即發兵南滿，但毛澤東覆電婉拒^{④⑪}。斯大林真正寄希望於中共的，不只是從南滿方向牽制日軍，而是在蘇聯苦戰德國之際，八路軍能夠直接助防他的蒙古緩衝國。據毛澤東的俄文翻譯師哲的回憶，從1941年秋季到1943年初，斯大林就此事三次親電毛澤東。第一次斯大林請中共派兩個師的兵力到內、外蒙古交界處，接收蘇聯裝備並設防，被毛澤東以後勤接濟困難和日本空軍的威脅為由婉拒；第二次建議由蘇聯提供武器，請中共在外蒙古和滿洲邊境開展游擊戰爭，又被毛澤東拒絕；最後一次，斯大林請中共在長城一線部署兵力，威懾日軍，因為這個要求和中共的軍事計劃相合，毛澤東同意酌情施行^{④⑫}。關於斯大林三求毛澤東的史實，到目前為止師哲的回憶尚是孤證。無論如何，抗戰期間，中共同「革命中心」蘇聯及其與外蒙古的關係，無疑是發生了重大變化。

毛澤東拒向外蒙古邊境派兵，可能是失去了加強中共地位、向蘇聯爭取外蒙古「回歸」的一次機會。事實是，在抗戰期間，國共兩黨心態一樣，都視外蒙古為次要的、可以留待將來解決的問題。在同時面對國民黨和日本的雙重軍事威脅的情況下，毛澤東只能優先考慮，如何使用中共的軍事實力會最有利於中共在國內發展。國共在外蒙古問題上的另一個共同點，是視莫斯科為問題的癥結所在。只是國民黨當局把外蒙古看作對蘇外交的一部份，而對中共來說，外蒙古獨立是蘇聯按照革命成功先後做出的一種安排。一個有關中共觀念的問題是，在抗戰期間，既然中共放棄了支持少數民族在「民族自決」原則下的「自由分離」，那麼中共是否依然能夠根據同一個原則，爭取已經分離的外蒙古同中國的「自由聯合」？在中共文獻裏，並沒有發現這種對列寧主義「民族自決」原則的分解式理解。可以見到的證據是，在認同中華民國的情況下，中共不再一如既往地明確支持外蒙古獨立。在抗戰期間，中共第一次對「現在中國的國境」做出了完整的表述。1939年12月15日，毛澤東參與撰寫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一文完稿，於1940年發表在延安出版的《共產黨人》雜誌上，後來又作為毛澤東的文章收入1944年版的《毛澤東選集》。在

《毛澤東選集》以後的版本裏，文章關於中國同周邊鄰國關係的說法，又經過多次修改，有一處細節涉及外蒙古。1939年文章中對中國北方邊境的描述是，中國「在東北、西北和西境的一部與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聯盟接壤」。這個描述以對外蒙古忽略不提的方式，避免了中共支持外蒙古獨立同國民黨當局立場的矛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毛澤東選集》又出版了幾種不同的版本。但是如1947年的版本所示，即使在國民黨政府根據1945年的中蘇條約承認了外蒙古獨立以後，《毛澤東選集》依然保留了1939年文章的原貌。直到1951年以後，由毛澤東親自審定的《毛澤東選集》正式出版，文章才加寫了「正北面，和蒙古人民共和國接壤」。這說的已經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同蒙古建交以後的情況了^{④3}。但是，長期支持外蒙古獨立的中共，實際上從未放棄外蒙古向中國「回歸」的期望。

四 「同志加兄弟」的分手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無疑是當時世界政治中的重大事件。對中國人和世界上的相關國家來說，新中國的成立不單純是政權更迭，更是國家和社會的再造。當時中共提出了「一邊倒」、「另起爐灶」和「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的外交方針，表明新中國外交並不是對中國「收復失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百年外交努力的簡單繼承，而是以一個「革命國家」的姿態，終止「舊中國」的外交關係，重新出發。儘管新中國外交方針的提出極具時代色彩，但在實踐上已有俄國十月革命的先例。西方學者的研究認為，1917年的俄國革命和1949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在堅定的革命話語下，選擇性、針對性地採用了國際法中的「情勢變更」原則（*rebus sic stantibus*，即在情勢發生重大變化時，可以修改或終止條約）。這種革命外交雖然態度決絕，但並沒有真正全面地單方面終止前政權所有的條約義務^{④4}。有鑒於這種觀點，對新中國外交三原則實行的實際情況，值得另作實證性的探討。

筆者提出這個問題，只是想再次強調本文在上篇開始時提出的觀點：「社會主義國家」誕生於「資本主義國際制度」，因此帶有與生俱來的矛盾。1949年以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其要旨是按照政治需要擇利行權，而不是根據國際通例循規蹈矩。在這個大前提下，中蒙關係作為個案，在相當一段時間裏其政治內容成為主導，而有關法理的問題變得次要。如果從國際關係通例的角度來看，在1945年中華民國政府和蘇聯政府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以後，僅需外蒙古按條約規定舉行全民投票，並在中蒙之間劃定邊界，中蒙之間比鄰而居的「正常」國家關係即可完成。外蒙古獨立的全民投票程序在1945年10月即已完結，然而，隨之而來的國共內戰擱置了並不簡單的劃界步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不但關於邊界走向的歧義在中蒙之間仍然繼續，更重要的是，似乎在國民黨政府時期已經解決的外蒙古獨立問題，此時給中蒙這兩個共產黨國家的關係帶來了親極反疏的困擾。換言之，中共在中國取得政權，使得中蒙革命政黨之間的「同志加兄弟」關係疊加於中蒙之間發展未久的

「國家關係」之上；在一段時間裏，源於共產主義的國家關係理念、蒙古民族的跨界狀態、蘇聯對兩國關係的持續影響，都對中蒙之間遠未成熟的現代國家關係造成干擾。中華民國在1945年確定的對外蒙古獨立的法律承認，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又在「階級解放」、「民族自決」、「兄弟黨」、「社會主義陣營」等政治理念下，成為可以重新討論的問題。對中蒙兩國的領導人來說，各自對「大中華」和「大蒙古」的政治訴求似乎又有了新的機會。

如上篇所述，烏蘭巴托對合併內、外蒙古為一個「大蒙古」的嚮往，一直受到蘇聯的壓制。1945年8月8日，蘇聯紅軍在中國東北加入對日戰爭，蘇蒙聯軍同時進入內蒙古境內。兩天之後，蒙古總理喬巴山(Хорлоогийн Чойбалсан)發布告蒙古民眾書，宣布蒙古軍隊將和蘇聯紅軍一起，「將我們骨肉同胞內蒙古蒙古民族在日本奴役之下解放出來」，實現「全蒙古自由獨立而單一民族的統一國家」^{④⑥}。國民黨當局自然非常緊張，擔心蘇聯、外蒙古同中共合謀，在東北和內蒙古成立一個「偽內蒙人民共和國」^{④⑦}。但是國民黨當局對上述三方之間關係的複雜性並不了解。隨着日本戰敗和蘇蒙聯軍的到達，在內蒙古出現了數個「自治」或「獨立」的「政府」，其中最具實力的是內蒙古人民革命黨領導的「東蒙自治政府」。8月18日，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發表宣言，明確表示了加入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意向，並派出代表到烏蘭巴托直接聯繫^{④⑧}。可是，儘管喬巴山的發兵檄文做如是說，但在莫斯科外交方針制約下的烏蘭巴托，根本無法對來自內蒙古的族人投桃報李。喬巴山只能告知他的內蒙古客人，內蒙古問題必須在中共的領導下解決，「在中共幫助下的民族自治就等於民族獨立」^{④⑨}。雖然如此，遲至1946年初，蘇聯駐烏蘭巴托使團注意到，一個「未能實現的大蒙古夢」依然在蒙古政界和民間流行。根據使團向莫斯科提供的一份詳細報告，所謂「大蒙古」思想，包含形形色色的對文化、民族、地緣等因素的不同考慮。其中最極端的主張，認為蒙古人民共和國應該將其南部邊界推至中國長城一線，以便掌控大批漢族人口，作為發展蒙古經濟的廉價勞動力。但是此時喬巴山已經改變想法，認為在嚴酷的國際環境下，通過內、外蒙古地域的合併來建立一個獨立自強的「大蒙古」，只是一種幻想；他轉而希望把內、外蒙古的三百萬蒙古人口一起帶入蘇聯，使蒙古有足夠多的人口和領土，可以同蘇聯的其他加盟共和國平起平坐^{④⑩}。

同樣，希望外蒙古回歸，使中國恢復晚清時期地緣形體的「大中華」思想，在中共黨內也長期存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周恩來代表中共向全國各黨派表明，雖然「任何民族都有自決權，這是毫無疑問的事」，但是鑒於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統一的圖謀，中共決定建立統一的共和國，而不是多元的聯邦制^{④⑪}。這就是所謂的「中華民族歷史性的自決」^{④⑫}。於是，1949年以後，中共規復外蒙古的思想源頭，又回到了從孫中山開始的中華民族國家的觀念。與烏蘭巴托企圖借助蘇聯力量來組織「大蒙古」一樣，中共領導也將中蒙的領土復合，寄託於莫斯科對外蒙古政策的改弦更張。從中國方面的材料看，在1949年和整個1950年代，中共領導人先後五次在不同場合向蘇共領導人提出外蒙古問題^{④⑬}。1949年2月，在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揚(Анастас И. Микоян)秘密訪華與中共領導會面期間，毛澤東首次提出外蒙古問題。其後更重要的一

次，是1950年毛澤東、周恩來同斯大林在莫斯科談判期間，提出要把外蒙古包括在中國的「大家庭」裏，可是遭到蘇聯的反對⁶³。在莫斯科談判以後，中共領導人也未放棄努力。1956年4月蘇共領導人米高揚再次訪華，周恩來又向他提出，兩黨在1949年就外蒙古問題交換意見時，斯大林的觀點和「黨的原則」不一致。劉少奇則表示，「中國人民對蒙古脫離中國很痛心，……中國人民把蒙古看作是和台灣一樣的中國領土的一部分」⁶⁴。

近現代蒙古的地緣政治特徵，是地處南、北——中、俄（蘇）兩個大國的夾縫之間。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60年代初中蘇分裂，在此期間蒙古得以一時坐享左右逢源之地利。中蘇分裂之後，蒙古又回到了左支右絀的窘境。筆者曾著文探討中蒙劃界問題，對這個歷史過程做過比較詳細的討論。這裏僅對該文的一些相關要點做一個簡述⁶⁵。

如上所述，即使在中、蒙、蘇三國以「同志加兄弟」相互對待的時期，中蘇兩國圍繞蒙古進行的博弈一直沒有停止。在中共執掌中國政權以後，蘇聯一如既往，力圖穩固其對蒙古衛星國的全面主導地位。同時，蘇共領導對中蒙之間聯繫的加深和國家關係在方方面面的發展，保持着高度戒懼。而對於中蒙兩國來說，1949年開啟了一個雙邊關係的新時期，為各自的政治、經濟意圖提供了新的機會。在整個1950年代，中共在處理國內少數民族地區的問題時秉承的一般方針是積極進取、適當干預。根據其說法，漢族在歷史上欠下了欺負、剝削少數民族的債，現在應當用「幫助」少數民族的方式來「還債」。中國政府將這種說法和做法也運用到對蒙古的關係當中，在「還債」和「幫助」的名義下，以優於蘇聯的條件同蒙古開展雙邊貿易，並且向蒙古的工業和基礎設施建設提供援建工人。蒙古自然樂於在中蘇之間的競爭中獲利。但是，除了中蘇同盟內部有關蒙古的糾紛仍在繼續之外，中蒙關係的驟然升溫也表明，在雙方之間長期存在的「大蒙古」和「大中華」的思想糾葛進入了一個新的模式。這也是為甚麼中蒙之間剛剛建立的善意的「幫助」關係，很快就變成雙方抵牾的原因之一。在當時雙方看來「正常」的「兄弟國家」關係，恰恰暴露了中蒙各自向現代「民族國家」轉型過程中存在的理念偏差。這些理念偏差的一個集中表現，就是雙方都願意把現代國家交往中常見的勞務輸出（中國援蒙工人），作為政府協議下的變相移民來處理。蒙方的要求是，從中國的內蒙古自治區遷徙一批蒙族人口到蒙古人民共和國。而中方願意承諾的是，向蒙古提供大批漢族移民，作為人口援助。雖然當時雙方的歧見是通過「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話語來表達的，但是分歧的癥結在於各自對「國人」和「族人」的定義，都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企圖。

中蒙之間這種內外不分、你我糾纏的狀態，因1960年代的中蘇分裂而結束。中蘇分裂在亞洲有關國家產生的一個後果是，解除了凌駕於共產黨國家關係之上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魔咒。此後，這個理念更經常地被各共產黨國家用作相互詬病的抽象原則，而不再真正具有對國家政策的指導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前一段時間被共產主義國家理念引入困境的中蒙國家關係現代轉型，又回到了在中華民國時期開始的軌道之上，即雙方關係在實際分離以後，在法律意義上的明確化。其標誌性的事件，就是繼中華民國政府在1946年

1月正式承認外蒙古獨立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同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在1962年12月簽訂了兩國之間姍姍來遲的劃定邊界的條約。

當然，以邊界條約的法律形式進一步確定中蒙兩國的「分家」，並不意味着邊界兩邊的政府完全放棄了過去的一些想法。比如在《中蒙邊界條約》簽訂以後，中蘇之間在1964年也開始了邊界談判，此時毛澤東以引人注目的方式，首次向外界公開了中共對外蒙古的想法。1964年7月10日，毛澤東在接見日本社會黨代表團時，指責蘇聯在1945年美、英、蘇的雅爾塔會議(Yalta Conference)上，以支持外蒙古獨立的名義，把外蒙古從中國分離出去，置於蘇聯控制之下，並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繼續反對外蒙古回歸中國^⑤。如果說毛澤東的這番言論主要是對蘇聯的歷史「錯誤」作出譴責，那麼其後中國外交部為應對蒙方詢問所做的準備，則反映出《中蒙邊界條約》給中共的外交話語帶來的實際變化。開始時，周恩來指示外交部通知中國各駐外使節，在應對蒙方有關毛澤東談話的詢問時，「不談歷史，不講我們現在的態度，也不說將來如何，這樣可保持很大主動權」^⑥。但是這個避免對外蒙古地位明確表態的「三不」方針並未實行。外交部最終下達的指示是使中國的立場明朗化，除了要求中國外交人員按照毛澤東的談話精神批評蘇聯在外蒙古問題上的做法以外，對中蒙關係的表達應是：「我們承認現狀，我們同蒙古簽訂的邊界條約就是證明。如果有人指責我企圖剝奪蒙古獨立，侵佔蒙古，我可表示：現在剝奪蒙古獨立和侵佔蒙古的是蘇共領導，不是中國。」^⑦

當時在中方看來，蘇蒙是沆瀣一氣，共同構成了從北面對中國的威脅；但是僅就中蒙兩國來說，雙方的國力懸殊，相互的威脅感自然是不能等量齊觀的。在中蘇關係迅速惡化的大勢下，《中蒙邊界條約》的簽訂並未減緩蒙古政府對南面鄰國的恐懼。在蘇蒙反對北京的唱和之間，這種恐懼反而有增無減^⑧。同時，烏蘭巴托依然保持着對內蒙古的蒙古族人的關切。尤其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蒙古官方密切注意中國各地特別是內蒙古的事態。在紅衛兵和各色「造反派」組織活動最狂悖的1966和1967年，蒙古駐華大使館向烏蘭巴托發回一系列報告，稱使館和蒙古駐華人員受到了種種詆譏和騷擾，這些行為反映的是中共領導人企圖切斷中蒙人民友誼、否認蒙古是獨立國家。報告注意到，內蒙古文革時期，加在烏蘭夫頭上的罪狀之一是「親外蒙」，「內蒙古人民……遭受到的嚴重迫害」。因此，使館建議蒙古政府對「與我國人民骨肉相聯的內蒙古人民的政治社會形勢、文化生活狀況進行研究」^⑨。前述1945年喬巴山在進兵內蒙古檄文裏所表達的對內蒙古族人的關切之情，在二十幾年後又發出了微弱的迴響。

五 結語

在冷戰時期同中國交惡的鄰國當中，蒙古是唯一沒有與中國捲入武裝衝突的國家。同時，蒙古與中國歷經幾百年的歷史糾葛、二十世紀外蒙古獨立過程的艱辛和蒙古族人的分離、清代以後中國所經歷的國家轉型的陣痛，以

及俄國(蘇聯)在帝國構建和世界革命的變奏中對蒙古的舉措，如此眾多的原因，在中蒙之間造成了種種恩怨情仇。這種複雜的情愫，即使是在冷戰結束以後，依然瀰散於兩國人民之間^⑥。然而，在二十世紀中蒙關係的各個階段，無論世人如何界定這個關係的「正常」與否，兩國關係仍然遵循近現代國際關係的規範，漸趨成形和穩定。這個歷史過程脈絡清晰，不可逆轉。其中有兩個關鍵步驟：第一個是中華民國政府承認外蒙古獨立，第二個是中國和蒙古訂立邊界條約。在外蒙古同中國實際分離幾十年後，中華民國政府在雅爾塔體系的框架裏對其獨立的承認，箇中意義自不待言。可是1962年《中蒙邊界條約》的簽訂，在當時冷戰方酣的國際政治中算不上是引人注目的國際事件。所以，特別有必要提出的是，在中蒙各自的國家發展史上，這個條約完成了一個具有多重歷史意義的重大步驟。

首先，原先在滿清王朝國家內部的內、外蒙古之間的軟性分界，至此成為中蒙兩國之間的固定國界。這意味着兩國現代地緣形體的形成的清晰化、固定化；蒙古國家獨立於中國的狀態以領土條約方式進一步得到確認；內、外蒙古永久離異，蒙古族人在現代國家範式下永久分居在國界兩邊。其次，中蒙劃界不僅使兩國之間一些源於歷史的政治訴求就此止步，更重要的是打破了雙方關於「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迷思和相關做法。所謂社會主義「兄弟國家」之間不需要相互防範，邊防的對象是帝國主義反動派等觀念就此消弭；兩國之間「有邊無防」或「有邊無界」的鬆散狀態，被雙方對邊界領土的寸土不讓和森嚴戒備所替代；中蒙兩國之間「同志加兄弟」、你我難分的「不正常」關係，至此完成了向領土、主權、人民界限分明的「民族國家」的「正常」關係轉型的最終步驟。再次，中蒙劃界和由此帶來的中蒙國家地緣形體固定化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拜中蘇關係惡化所賜；中國同「蘇聯第一衛星國」蒙古的劃界，在當時是確立了一條連同中蘇邊界、總長11,900多公里的敵對邊境。但是，這樣一個一直持續到冷戰尾聲的、橫貫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對抗態勢，如果沒有清晰的中蒙劃界，或許會導致更多的邊境衝突。

在冷戰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同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敵友關係經歷了令人眩目的反轉變化的緣由往往被放在相對短期的意識形態或地緣戰略的框架內加以解說。同這些牽動全球格局的大國關係相比，中蒙之間的恩怨情仇似乎只是冷戰國際史中的細微末節。然而，「個中妙趣誰堪語，最是初醺未醉時」(陸游：《對酒》)。回視冷戰正酣之時，兩大意識形態體系橫眉冷對，幾個大國不共戴天，所謂「代理人戰爭」(proxy war)在歐美以外殺得血流成河。相比之下，處於冷戰邊際的中蒙齟齬只算得上是「初醺未醉」。正因為沒有完全淹沒於冷戰的喧囂之中，中蒙關係得以展現出比冷戰更為久遠和豐富的歷史發展脈絡。大清國的「外蒙古」、中華民國的「特別地方」、中共革命的「打成一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同志加兄弟」，及至1962年《中蒙邊界條約》最後完成的中蒙兩國比鄰而居——這些概念標誌着中蒙關係演進的一個個歷史節點。這種從體制到觀念的不斷更新，其意義遠非冷戰的話語所能涵蓋。

最後有幾句題外話。研究中蒙關係在近現代意義上「正常化」的過程，對拓寬冷戰歷史研究或許可以提出一個方法論的建議。概而言之八個字：「避重就輕、取長補短。」何謂「避重就輕」？與其反芻以往研究中的濃墨重彩，不如深究其中的輕描淡寫。何謂「取長補短」？解說歷史現象既要身臨其境，取其一時的當下之意，更要後顧前瞻，察其長久的大歷史地位。若如此，何嘗不能在冷戰年代處於醞釀狀態的大國關係的邊緣或陰影下，重新發現一些更有久遠意義的歷史線索。（本期續完）

註釋

- ① Alexander C. Diener and Joshua Hagen, *Border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45.
- ② 當代中國人習慣沿用清代用語，稱獨立的蒙古國為「外蒙古」，以別於中國境內的內蒙古。本文敘述照例，但凡用「蒙古」或「蒙古人民共和國」，皆指獨立的蒙古國。
- ③ Sergei Luzianin, "Mongolia: Between China and Soviet Russia", *Far Eastern Affairs*, no. 2 (1995): 53-70；〈斯克良斯基和列寧就向蒙古推進問題交換的便條〉（1921年6月14日和15日），載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五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頁45。
- ④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分委員會通過的蘇聯憲法草案〉（1922年12月5-16日之間）、〈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會議記錄〉（1922年12月16日）、〈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記錄摘抄〉（1922年12月18日），載《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五卷，頁401-405、406-14、416-17。
- ⑤ 〈列寧給代表大會的信：續記：關於民族或自治化問題〉（1922年12月31日），載《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五卷，頁440-42。
- ⑥ Baabar (Bat-Erdene Batbayar), *Twentieth Century Mongolia* (Cambridge: White Horse Press, 1999), 250; Sergei Luzianin, "Mongolia", 59-62；陳獨秀：〈我們的回答（摘錄）〉（1924年9月17日）、蕭楚女：〈顯微鏡下之「醒獅派」〉（1925年10月），載中共中央統戰部編：《民族問題文獻彙編（1921.7-1949.9）》（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60-61、65。
- ⑦ 顧維鈞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330-49。
- ⑧ 李大釗：〈蒙古民族的解放運動〉（1925年3月），載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註：《李大釗全集：最新註釋本》，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48。
- ⑨ 毛澤東：〈中國的紅色政權為甚麼能夠存在〉（1928年10月5日），載《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頁47-56。
- ⑩ 筆者對中共國家觀念演變的討論，參見劉曉原：〈中國共產黨國家疆域觀的淵源與發展（1921-1949）〉，《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7年4月號，頁13-34。
- ⑪ 毛澤東：〈關於一全大會選舉中央委員與人民委員〉（1931年12月1日），載中國共產主義研究小組編：《毛澤東集》，第三卷（出版地不詳：一山圖書供應社，1976），頁44。
- ⑫ 〈中央給蘇區中央局第七號電——關於憲法原則要點〉（1931年11月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1931年11月7日），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七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492-93、772-76。
- ⑬ 有關蘇聯早期面臨的來自民族問題的「巨大挑戰」，參見Hélène C. d'Encausse, *The Great Challenge: Nationalities and the Bolshevik State, 1917-1930* (New York: Holmes & Meier, 1992)。
- ⑭ 當時反映「國恥」觀念的中國地圖有很多版本，例子之一是亞新地圖社：《中華國恥地圖》（武昌：亞新地圖社，1931），www.loc.gov/item/2007629181/。

- ⑮ 〈中共中央委員會告康藏西番民眾書——進行西藏革命運動的鬥爭綱領〉(1935年6月)、〈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內蒙古人民宣言〉(1935年12月20日)，載《民族問題文獻彙編(1921.7-1949.9)》，頁285-91、322-24；中國軍事博物館：《毛澤東軍事活動紀事：1893-1976》(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4)，頁179。
- ⑯ 胡煥庸：〈中國人口之分布〉，《地理學報》，第2卷第2期(1935年4月)，頁11、14-17。
- ⑰ 〈中央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1935年8月20日)，載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頁126-27。筆者對中共長征的地緣和民族政治的意義做過較詳細的討論，參見劉曉原著，萬芷均譯：《邊緣地帶的革命：中共民族政策的緣起(1921-1945)》(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8)，頁75-97。
- ⑱ 中共長征結束以後，以陝甘寧為中心對周邊少數民族的一系列研究及政策文件，參見《民族問題文獻彙編(1921.7-1949.9)》，頁347-956。筆者對1945至1951年間涉及中國邊疆的軍事、政治和外交事件的研究，參見Xiaoyuan Liu, *Reins of Liberation: An Entangled History of Mongolian Independence, Chinese Territoriality, and Great Power Hegemony, 1911-1950*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6), 113-421; *To the End of Revolut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ibet, 1949-1959*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0), 13-89。
- ⑲⑳ 〈毛澤東在俄界會議上的報告和結論〉(1935年9月12日)，載《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頁151；151-52。
- ㉑ 毛澤東：〈湖南建設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1920年9月3日)、〈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的中國從湖南做起〉(1920年9月5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編：《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頁453-57。
- ㉒ 陳獨秀：〈十月革命與中國民族解放運動〉(1925年11月7日)，載《民族問題文獻彙編(1921.7-1949.9)》，頁67。
- ㉓ 相關的中共研究的例子，參見劉春：〈怎樣團結蒙古民族抗日圖存〉(1940年3月20日)、羅邁：〈回回問題研究〉(1940年6月16日)，載《民族問題文獻彙編(1921.7-1949.9)》，頁819-28、841-56。
- ㉔ Sergei Luzianin, *Rossiiia—Mongoliia—Kitaii v pervoi polovine XX v: Politicheskie vzaimootnosheniia v 1911-1946 g.* (Moscow: Far Eastern Institute of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2000), 135-36.
- ㉕ 〈關於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機構和工作問題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1920年12月21日)，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第一卷(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49-57。相關研究參見Alexandre Andreyev, *Soviet Russia and Tibet: The Debacle of Secret Diplomacy, 1918-1930s* (Leiden: Brill, 2003)。
- ㉖ 烏蘭夫：〈雲澤關於內蒙土地和自治問題給中央的報告〉(1946年8月1日)，載《民族問題文獻彙編(1921.7-1949.9)》，頁1057-58。
- ㉗ 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8), 443-44。
- ㉘ 〈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繼續討論目前政治形勢及全國工作布置會議上〔溫〕裕成的發言(摘錄)〉(1930年8月3日)，載《民族問題文獻彙編(1921.7-1949.9)》，頁482；〈斯托利亞爾給洛左夫斯基的信〉(1930年8月5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關於中共內部狀況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書記處的通報〉(1930年10月9日)，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第九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頁257-62、361-68。
- ㉙ 〈斯大林給莫洛托夫的電報〉(1930年8月13日)，載《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27-1931)》，第九卷，頁300。

- ②③ 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1920-1960）》（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7），頁352-54；355。
- ②④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頁603；〈中央關於紅軍行動方針致王明電〉（1936年8月25日），載《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頁661-62。
- ②⑤ 參見 Ivo Banac, ed., *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 1933-1949*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30-31, 37。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日記顯示，「遊牧人」是共產國際對長征中的中共的代稱。
- ②⑥ 〈共產國際書記處及王明、陳雲關於改變援助方法致中央書記處電〉（1936年11月3日）、〈軍委主席團關於西路軍暫勿再西進致徐向前、陳昌浩等電〉（1937年1月5日），載《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頁862、904。
- ②⑦ 〈朱總司令為受降問題向美英蘇三國致送說帖〉（1945年8月18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軍事文集》，第一集（出版地不詳：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1951），頁34-36。
- ②⑧ 劉少奇：〈關於過去白區工作給中央的一封信〉（1937年3月4日），載《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一冊，頁806-808。
- ②⑨ 〈中央關於反帝鬥爭中我們工作的錯誤與缺點的決議〉（1931年12月2日），載《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七冊，頁532。
- ②⑩ 洛甫（張聞天）：〈我們對於民族統一綱領的意見〉（1937年5月1日），載《民族問題文獻彙編（1921.7-1949.9）》，頁456-57。
- ②⑪ 毛澤東：〈論新階段〉（1938年10月12日至14日），載《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一冊，頁619-20。
- ②⑫ *The Diary of Georgi Dimitrov, 1933-1949*, 164.
- ②⑬ 中國軍事博物館：《毛澤東軍事活動紀事（1893-1976）》，頁455、458。
- ②⑭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頁214-15；《峰與谷：師哲回憶領袖毛澤東》（北京：紅旗出版社，1997），頁96。
- ②⑮ 〈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1939年12月15日），《共產黨人》，第4期（1940年2月），頁2-10；毛澤東：〈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載《毛澤東選集》，第二卷（晉察冀中央局，1947），頁55；〈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載《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頁591-92；張建華：〈《毛澤東選集》出版往事〉，上、下（2012），中共黨史網，www.zgdsw.com/article/804.html；www.zgdsw.com/article/805.html。
- ②⑯ Luke T. Lee, "Treaty Re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Study of Complianc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16, no. 2 (1967): 244-314; Philip Noonan, "Revolutions and Treaty Termination", *Penn State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2, no. 2 (1984): 301-30; Jay R. Goldstein, "Chinese and Western Treaty Practice: An Application to the Joint Declaration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Great Britain Concerning the Question of Hong Kong", *America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1, no. 1 (1986): 167-94.
- ②⑰ 外交部亞西司：〈中蒙關係案〉（1947年6月至1949年8月31日），台北外交部資訊處，112-1。
- ②⑱ 外交部亞西司：〈東北及內蒙現狀研究〉（1946年3月1日至12月31日），台北外交部資訊處，197-1；〈偽內蒙人民共和國案〉（1947年7月5日至7日），台北外交部資訊處，106-4。
- ②⑲ 達瓦敖斯爾：〈我的經歷見聞〉，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內蒙古文史資料》，第三十輯（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頁157-58。
- ②⑳ 〈中共晉察冀中央局關於察綏兩盟政權問題給中央的報告〉（1945年11月9日），載《民族問題文獻彙編（1921.7-1949.9）》，頁975。筆者關於中共同1945年以後的內蒙古自治運動關係的研究，參見 Xiaoyuan Liu, *Reins of Liberation*, 113-280。

- ④⑨ “Excerpts from a Report by the Head of the Soviet Mission in Mongolia I. Ivanov to Moscow” (12 January 1946), Wilson Center Digital Archive,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22506>.
- ④⑩ 周恩來：〈關於人民政協的幾個問題（摘錄）〉（1949年9月7日），載《民族問題文獻彙編（1921.7-1949.9）》，頁1267。
- ④⑪ 江平編：《中國民族問題的理論與實踐》（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頁113-14。
- ④⑫ 喬冠華：〈周總理對蘇聯代辦談蘇聯佔領鄰國領土問題的提綱（稿）〉（1964年7月24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5-01295-01。
- ④⑬ 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中蘇關於外蒙古的交涉，參見劉曉原：《邊疆中國：二十世紀周邊暨民族關係史述》（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頁175-212。這次中蘇關於外蒙古問題的對話，在有關莫斯科談判的檔案中找不到線索。多年以後，即1972年9月，周恩來在同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的一次談話中，表明確有其事。參見“Record of the Third Meeting between Prime Minister Tanaka and Premier Zhou Enlai” (27 September 1972), Wilson Center Digital Archive,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21228>。
- ④⑭ “Information Memorandum, ‘About the Claims of the Chinese Leaders with Regard to the 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 ” (30 January 1964), Wilson Center Digital Archive,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3098>。
- ④⑮ 劉曉原：〈中蒙劃界史迹初探（上）——「同志加兄弟」的博弈〉、〈中蒙劃界史迹初探（下）——從兄弟到鄰居〉，《二十一世紀》，2020年6月號、8月號，頁76-98、52-76。
- ④⑯ 〈毛主席接見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細迫兼光等日本社會黨中、左派人士的談話記錄〉（1964年7月10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5-01897-01。
- ④⑰ 《外交通報》，第95期（1964年7月28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5-01897-03。
- ④⑱ 《外交通報》，第126期（1964年9月11日），中國外交部檔案館，105-01897-03。
- ④⑲ 拉琴科通過對前蘇聯和蒙古檔案的研究得出結論，認為蒙古政府在中蘇分裂的情況下，並非盲目追隨蘇聯，在反對中國的問題上，有時甚至比蘇聯還要激烈。另外，蒙古黨內在1964年發生過一次嚴重的派別鬥爭，中心問題是蒙古對中蘇分別應該採取甚麼樣的政策，其結果是親蘇派獲勝。參見Sergey S. Radchenko, “The Soviets’ Best Friend in Asia: The Mongolian Dimension of 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 42* (November 2003), 9-18。
- ④⑳ 蒙古駐華大使館的報告材料，分別參見〈關於內蒙古自治區開展文化大革命情況〉（1967年5月29日），ГХТА（蒙古對外關係中央檔案館），ф.5, д.2, х/н.366, x.1-20；〈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蒙古人民共和國駐中國大使館附近舉行的針對蒙古人民的挑釁示威遊行〉（1967年6月5日），ГХТА, ф.5, д.2, х/н.361, x.1-34；〈關於中國挑釁中蒙友好關係的種種活動與表現〉（1967年8月9日），ГХТА, ф.5, д.2, х/н.362, x.1-72；〈關於所謂的烏蘭夫十五大罪狀〉（1967年9月24日），ГХТА, ф.5, д.2, х/н.366, x.56-90。
- ㉑ 有關當前蒙古社會中針對中國和中國人的焦慮和仇視，參見Franck Billé, *Sinophobia: Anxiety, Violence, and the Making of Mongolian Identit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5)。

劉曉原 美國弗吉尼亞大學大衛·迪恩東亞研究所講座教授，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紫江學者講座教授。